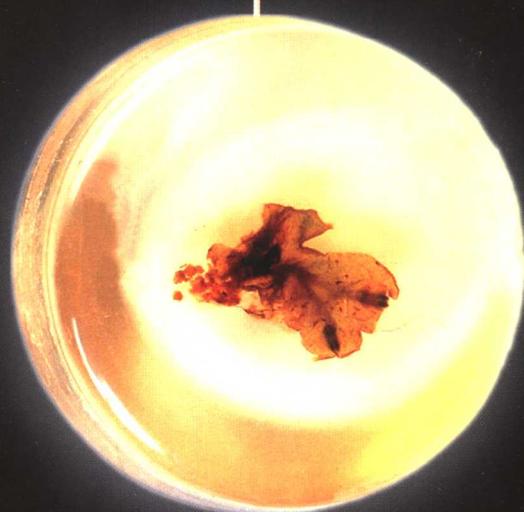


The
Frontier of
Literature
No.12

文学前沿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



学苑出版社

The
Frontier of
Literature
No. 12

文
學
前
沿



華文書局

The
Frontier of
Literature
No. 12

文学前沿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 主编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前沿·第12辑/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5077—2840—8

I. 文… II. 首… III. 文学研究—文集 IV.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0401 号

责任编辑:洪文雄

封面设计:周毅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经 销: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965×1270 1/16

印 张:20

字 数:28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 册

定 价:24.00 元

思想性 / 学术性 / 前沿性

《文学前沿》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排序)

主任：钱中文 袁行霈

委员：

王一川	王元骧	王先霈	王岳川
王逢振	叶嘉莹	朱立元	吴元迈
吴中杰	吴思敬	李炳海	林毓生
周策纵	杨义	张炯	张燕瑾
陈炎	陈伯海	陆贵山	罗钢
罗宗强	金元浦	项楚	胡经之
饶芃子	段启明	费振刚	赵宪章
赵敏俐	徐公持	盛宁	黄天骥
郭志刚	曹顺庆	曾繁仁	童庆炳
蒋述卓	董乃斌	葛晓音	

《文学前沿》编辑部

主编：左东岭

副主编：邓小军 吴相洲 陶东风
邱运华 陶礼天

责任编辑：汪龙麟 魏家川 洪文雄

目录

• 文学研究 •

- 蔡丹君 舜在屈原辞中特殊地位考论(3)
- 陈柏华 魏宏灿 夏启其人新论(16)
- 汪玉川 《尚书》“论刑典而未及仁义”说(27)
- 赵建梅 从牛僧孺与洛阳的关系看其思想心态(35)
- 王宇 江湖诗人曾极生平事迹考论(45)
- 张若雅 薛涛、鱼玄机合论——兼及女性文学的历史境遇(62)
- 曹智 苏轼旷达新论(73)
- 朱则杰 《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待访书目”补遗(80)
- 王小舒 钱谦益前后期诗歌创作的异同(91)
- 张绍华 为问所以然,一真黜百假——论袁枚思想的批判精神(100)
- 姚金笛 颜光敏和明遗民的交往(114)
- 储著炎 抒情的本色性——试论唐传奇与元杂剧爱情题材作品的内在联系(120)
- 张维娟 元杂剧夫妻父子团圆模式的文化意义(129)
- 邓丹 中国戏曲史上《笠翁十种曲》之特异性(138)
- 李洪蓄 忠臣智士的悲剧——《千忠戮》中的方孝孺与程济(154)
- 李延年 孙天任 明代前期教育小说的概况与分类及特点(160)
- 韩婷婷 寒儒的悲哀——试论清代海烈妇故事(171)
- 方维保 张家平 死本能的体验与审视——“精神分析学视域下的新时期小说的主题形态研究”之一(180)
- 胥晓秋 从意义消逝看流行歌曲的歌词(193)
- 赵月 韩剧:家庭叙事的传统文化魅力与“爱情童话”的现代镜像表达(197)

• 文论研究 •

- 冯巍 钟嵘《诗品》阮籍诗“独出《小雅》”解(205)
雷乔英 “文质疏内”的内涵及演变(213)
周蕾 《中兴间气集》刘长卿评语疏证(222)
李琳 高启的诗学观念及其形成原因
——读《独庵集序》笔记(236)
赵建章 张作祥 姚鼐以“妙悟”论“文”评议(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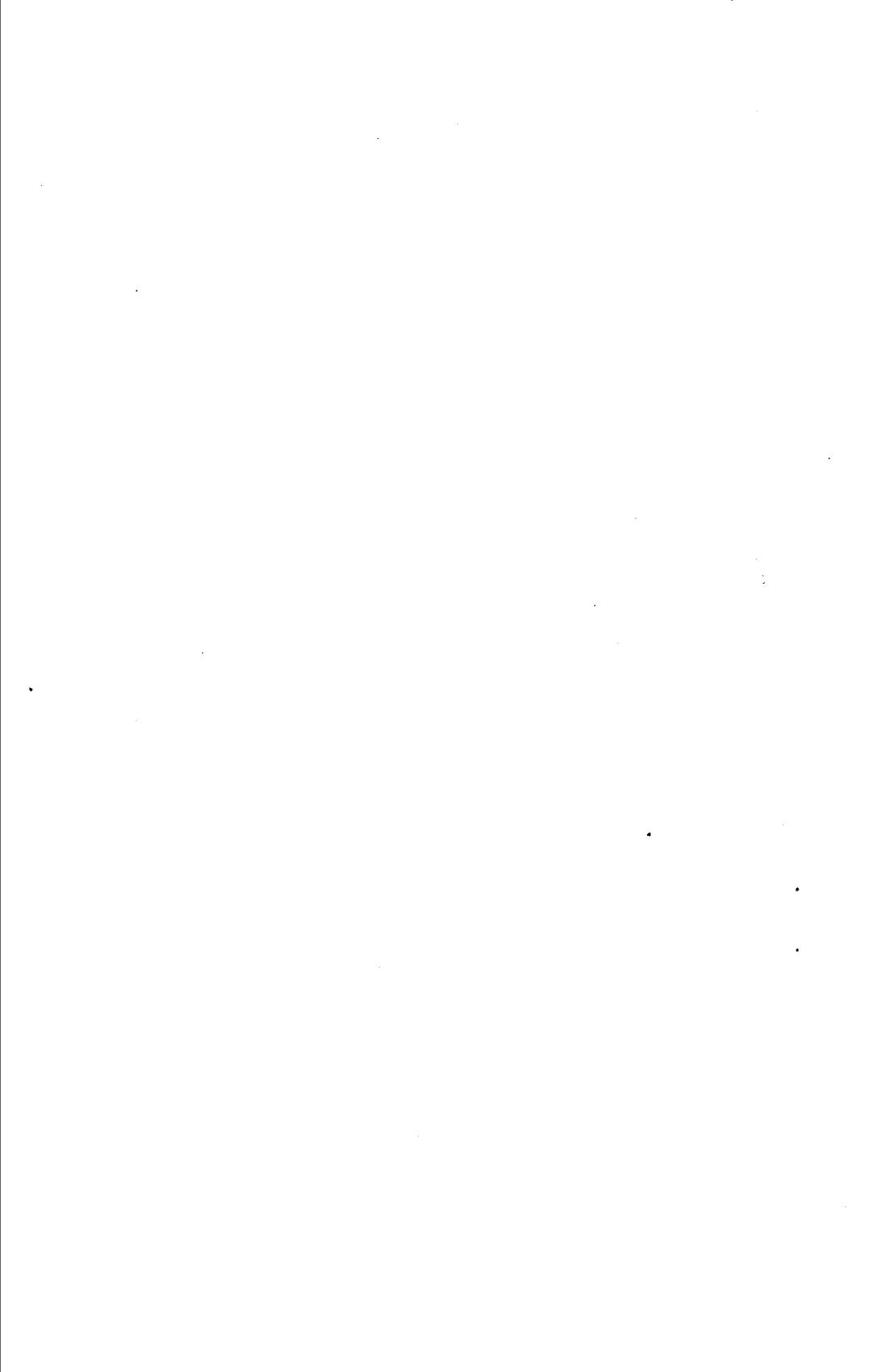
• 学术史研究 •

- 罗军凤 走出疑古时代的《左传》学研究——近三十年来
《左传》研究述评(253)
高静 顾颉刚《诗经》研究面貌的成因(275)
张清 20世纪欧美汉学界中国明代“四大奇书”研究概览(285)

• 学术资讯 •

- 《中国诗论史》出版学术座谈会综述 (297)
北京 2006 年《文心雕龙》研究与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学
术研讨会综述(301)

• 文学研究 •



舜在屈原辞中特殊地位考论

蔡丹君

舜在屈原辞中地位很特别。他在辞中是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之外的最为正面的形象之一；与辞中提到的其他历史人物相比，舜的出场次数最多。不论是以《湘君》、《湘夫人》来专门记述与舜相关的传说，还是在《离骚》中多次对舜之德行的礼赞，或者在《天问》中对舜某些具体史实的追问，屈原总能不厌反复提及舜；同时，他的形象也是最丰富的，在屈原辞中担任了多种角色：时而是苍梧之野、湘水之畔、玄圃之上的飘逸神灵，时而是作者敷衽长跪而对之的陈辞对象，时而又是被诗化了的爱情故事中的男主人公等等。屈原在辞中相对突出舜、相对详细地描写舜，并对之赋予浓烈的情感，这是出于何种原因呢？

以往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屈原辞存在大量的历史真实^①。屈原对于历史人物在作品中的设置，并不是随意而偶然的，而是暗含了他的历史观和历史参照之下的现实关怀。要理解舜在屈原辞中地位较特别这个小细节，就必须探讨楚国的历史背景和屈原本人的历史观，舜与楚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屈原对舜之形象的定位

对于舜这位中原帝君，屈原不仅仅将之当作一个正面历史人物来膜拜，而是对他进行了更多文学性的刻画，赋予其更多的个人情感。屈原在辞中为舜设立了三个颇具当代感的形象：

1. 陈辞对象、“中正”圣人；

屈原辞将舜作为陈辞对象，对其道德上的信任和膜拜可比于圣人。如《离骚》中写道：“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离骚》），“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楚辞补注》注

之曰：“言己所以陈词于重华者，以吾得中正之道，耿然甚明故也。”“中正”的意思，汪瑗《楚辞集释》注曰：“中者，无‘过，不及’之谓；正者，不偏不倚之谓。指己所陈之词得圣人中正之道也”。在屈原眼中，舜是“中正”之道的持有者。

对于舜的品德，屈原尤其赞颂他的“耿介”：“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耿介是屈原所推崇的，也是他本人最突出的品德。宋玉《九辨》里的“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可以高度概括这一点。而且，屈原还认为这种耿介的品质，与国家的兴衰之路有关系。《山带阁楚辞集注》说：“遵道得路，言尧舜知明而守，固能遵用三后之道，而致太平。原盖以三后自比，而望其君为尧舜也。”屈原认为当世之君只有持尧、舜那样的耿介品质，才能“遵道而得路”，使国家得以振兴。

德行高尚、品质耿介的舜仿佛是屈原的精神知己。例如《离骚》中写道：“朝发轫于苍梧，夕余至乎县圃。”苍梧是舜葬之地。这个“朝发夕至”的路线并非是实写，而是屈原对自己精神之旅的一种象征性写法。《楚辞章句》注此句曰：“言己朝发帝舜之居，夕至县圃之上，受道圣王，而登神明之山。”而屈原将神游路线安排为从舜所葬之地出发，说明舜之所在是他的精神圣地。屈原梦想能够“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这种与重华同游瑶圃的梦想，看似荒诞不经，其实包含了屈原对舜这位精神友朋的渴望，希望能与这样持中正之道，秉耿介之德的中原圣君偕行。而明知圣人不可再逢时，他便会长叹：“重华不可逢兮，孰知余之从容！”

除了这些直接的表达，屈原还在《湘君》、《湘夫人》两篇中，借娥皇女英对舜的思念，写出了自己对舜的依恋之情：“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襟兮醴浦。”王逸注曰：“屈原托与湘夫人共邻而处，舜复迎之而去，穷困无所依，故欲捐弃衣物裸身而行，将适九夷也。”

2. 神人、神巫；

舜在屈原辞中具有神巫性。如：“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湘君》）正是群神集结于九疑的宏大场面；另有“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在提到舜的时候，屈原常常提到昆仑或者与“县圃”、“瑶之圃”等。县圃即玄圃，是古人心中仙界。《楚辞补注》引《山海经》云：“‘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渤水，其中多蠃母，其上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采黄金银，实惟帝之平圃。’平圃即玄圃也。”所

以，屈原总是想像舜处于仙界，与天地同在，无疑是将他拟想成能够出入玄圃的神人。

3. 爱情传说中的主人公：

在屈原辞的所有历史人物中，舜是唯一一位被作者置于具体的爱情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这在屈原辞中的其他历史人物身上是很难找到的。《湘君》和《湘夫人》等篇将二妃前去求舜以及舜对二妃的眷恋和迎接的过程，写得极为曲折婉转。虽然几乎都是从侧面来进行烘托，但湘君、湘夫人对舜的思念和眷恋之情，写得极为接近俗常。例如二妃思念舜之愁态是“目眇眇兮愁予”（《湘君》）；前往寻找舜之神灵而却又“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云中君》）将欲去还留时心中的矛盾展现得十分婉转微妙。这些爱情传说为舜染上了一种世俗感。

除了舜，屈原在辞中提及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如《离骚》中开篇即云“帝高阳之苗裔兮”。王逸注云：“高阳，颛顼有天下之号也。”而实际上，舜也是属于颛顼一支：《史记·五帝本纪第一》云：“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另外，屈原辞还历史性地评价了如尧、汤、禹、夏康、后羿、吕望、周文王、武丁等等人。这些历史人物，全部来自中原。这说明，屈原作为楚国人，却将自己看作是中原帝君的后裔；他的历史回顾，不是对楚国历史进行梳理，而是提取中原历史文化的精髓进行思考和研究。

以上的材料，让我们不禁要问：来自中原的舜为何在屈原辞中备受青睐，角色繁多？楚人屈原为何要到中原文化中寻找本民族的源头，又为何要以中原历史文化作为自己历史反思的主要对象？下面我将从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和屈原的历史观入手，对这些问题进行从整体到个体的分析和探究。

二、楚国文化心理的变迁与屈原 对中原历史文化的接纳和整理

屈原有一种历史谱系情怀。这种“历史谱系情怀”，就是对过去事物的来龙去脉加以整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归纳分类，呈现出富有规律性的谱系，以用于指导现实。这种情怀的具备，不仅与屈原政治身份有关——“三闾大夫”之职责就是掌管楚姓三族姓氏的谱系，“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王逸《离骚章句》序）；同时也因为屈原身处楚国国力衰

弱，政权飘摇的特殊历史时期，对历史的反思变得更为积极主动。所以，身处此职的楚国贵族屈原，不但有着对楚历史以及中原历史了如指掌的知识素质，而且有着立足于此的政治追求。

这个历史谱系以整理并呈现历史成败、国家兴亡的规律为目的，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全部来自中原历史文化。它由正反两个部分组成，一面是正直的“耿介”派，一面是昏庸的“溷浊”派。“耿介”派的正面形象，是那些善于“举贤授能”的兴国之君和贤能之士，如：“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汤禹俨而祗敬兮，周道论而莫差”（《离骚》）等等。而“溷浊”派的反面形象，大都是亡国之君和毁溃社稷的形象，有放纵情欲、迷恋声色以至失去尊位的“夏康”，有“淫游”、“好射”而“鲜终”的后羿，还有暴君夏桀、后辛等等（同上）。而处于“中正”地位，备受作者青睐的舜，无疑是这个历史谱系的中心人物。

屈原摄取中原历史文化的精髓进行思考、研究，作为自己历史谱系情怀的所系，从根本上说，是由楚地数百年来的文化心理变迁决定的。这种变迁，简言之，就是在被中原文化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中，楚国由最初的自称蛮夷，发展为主动到中原文化中为本地域、本民族追根溯源，主动向中原文化靠拢。而在各个方面都日趋于统一的战国末期，这种心理更为凸显。一方面，因为楚人在前期向中国的北部进发的过程中，加速了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这给予了楚人更宽容的历史视野和更广阔的现实梦想；而另一方面，是因为楚国渐衰，在面临强秦吞并的威胁时，自然开始转向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从中寻找自救之途。故而此时审视、研究中原文化，参照其兴衰规律和历史成败的经验教训，已是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政治目的的自觉行为。“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同上）的屈原，是想在历史中寻找和发现规律，用以辨明现实的走向，拯救濒危的楚国。因此王逸注“耿吾得此中正”一句云：“耿，明也。言已上睹禹汤文王修德以兴，下见羿浇桀纣行恶以亡，中知龙逢比干执履忠正身以菹醢，乃长跪而布衽俛首自念，仰诉于天，则中心晓明，得此中正之道。”（同上）王逸是从历史视角的角度来说明中正的意思，而这正切合屈原的历史观，以及这其中包含的一种历史谱系情怀。

楚人文化心理的变迁经历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楚国在西周时期国小位卑，并不受中原的重视，直到周成王时才被封有级别较低的子、男之爵。《史记·楚世家》记载曰“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即使如此，楚人仍保持自居蛮夷的倨傲，这种倨傲

可能因为坐井观天，不知天高地厚，也有可能是楚人一种自卑心理的表现，总之，当时楚人对“中国”及其文化的态度，是疏远甚至有敌意的。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为宣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又如另一段记载：“（殇公）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在楚国历史的早期，中原文化和楚文化有着很深的隔阂。

到了楚庄王时，武力强盛，在对待中原的态度上由以前的敌视变成了藐视。楚庄王问鼎中原就是一个例子。《史记·楚世家》云：“是岁（楚穆王四年）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乘。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以为九鼎。’”楚庄王在北上的侵伐中连连得胜，自大心理极度膨胀。周室衰微，对于“观兵周郊”的军事挑衅，不但不敢交战，反而屈服——定王遂派王孙满慰劳楚军，楚庄王趁机向王孙满问九鼎之轻重。九鼎是王权的象征。《尚书·周书》序云：“成王在丰，欲宅洛邑。武王克商，迁九鼎於洛邑，欲以为都。故成王居焉”。而对于周人眼中的国器，楚庄王轻蔑地说“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以为九鼎”。楚庄王藐视中原和周王室的态度，与此前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口号、晋文公此前平息王子带之乱、保护周襄王等维护周王室天子之尊的态度，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内在原因，就是因为楚人此时尚未完全改变自居蛮夷心理，仍然是自负地处蛮南，认为本族文化与中原文化深有区别。

但是，中原与楚地的文化交流一直没有中断过。从熊绎到楚庄王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渐趋强大的楚国，在表面态度上虽然仍对周王室不以为然，实则对中原文化的学习已经很频繁了，对中原文化的拒斥感，在逐渐褪去。如王室带头开始学习中原文化。屈原辞中写道：“奏《九歌》而舞《韶》兮，聊暇日以偷乐。”王逸云：“《九歌》、《九德》之舞，禹乐也；《韶》、《九韶》，舜乐也，《尚书》：箫韶九成。是也。”（《离骚》）这说明王室所用的音乐，也是来自中原的禹、舜所制之乐。音乐文化的变迁，意义重大。而郭店楚简出土后，学者发现郭店一号墓楚简的主人，是位“东宫之师”，即楚国太子的老师。这批楚简很可能就是他的教科书或者

教学参考书^②。其中道家作品两种四篇，儒家著作十一种十四篇。如其中《唐虞之道》这一篇，则赞颂了舜的爱亲与尊贤之道^③。中原文化的主流——儒道文化，也成为了楚文化的主流^④。

在民间，中原文化也得到播扬。《论语·微子》中提到的孔子周游列国，入楚为说教，楚狂接舆为之唱《凤兮》歌之事，说明孔子在楚国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并被以凤来比喻其德行，说明他在楚国还是受到尊敬的。而《孟子·文公上》中记载了一个不太著名的楚国游学者陈良，他比孔子更能说明民间文化交流的事实：“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获之先也。”

中原文化的渗透和文明的不断进步，使之渐渐成为楚文化的多个方面的决定力量，楚国蛮夷之气渐减，开始与中原文化渐渐融合。而中原儒道思想开始深入到楚国的道德伦理追求和政治领域的建设中，成为主流思想。虽然楚人没有改变某些原有的文化习俗，如巫觋祭祀等，但这些文明的较低层次中的部分其实已经只是楚文化中的一个“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而中原文化中的儒道思想已经位居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⑤。楚人的文化心理至此发生了重大的变迁。

屈原时代，楚国开始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梁启超总结道，“在当时诸国中，幅员之广莫如楚，故入战国九十年间，秦不敢有所加楚，诚惮之也。及九十一年，怀王见欺于张仪，召秦兵以自取败，十二年间，三丧其师，上流形盛，尽入于秦，楚几不国矣。百三十六年，秦遂入郢都。楚东徙于陈，距怀王初战秦时四十五年耳。……楚以五百年积累之业，怀王一朝瞀惑而颠坠之”^⑥。站在楚国迅速走向灭亡的边缘，屈原写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的悲壮心声。

而他心中的求索之路，其实即是寻找历史的皈依感，是沿着中原文化的历史延伸的，“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於正道而还已也”(《离骚章句》序)，他认为楚国也存在于这条兴亡规律之中，希望楚君遵循圣君的兴国之道，而避免昏君的亡国之途。

所以，屈原围绕中原历史进行研究，建立中原人物的历史谱系，和他对舜的尊崇态度，本质上反映的正是楚国对中原文化的接纳立场，即承认楚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一脉。屈原辞就是楚人文化心理发生重大变迁之后的一个结果。

三、舜与楚文化关系

而在众多中原历史人物中，舜成为最能引起屈原注意的一位不是偶然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在所有正面的、能代表中原正统文化的历史人物中，舜是与楚国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来自于中原的舜，其历史与传说在楚国已经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因为兼有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浓厚色彩，舜其实是这种文化心理变迁之下，被楚人不断强调的一个文化证据，是楚人将本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拴得更紧的一条纽带。舜的历史与传说是楚人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是楚人屈原创作作品时无法回避的一个语境。

《尚书·舜典》说：“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其中，“窜三苗于三危”指的是舜曾经对三苗地区即后来的楚地区发动过残酷的战争，将三苗人驱赶到边缘地带。但是这段历史中血腥的战争部分，被后来的记载淡化了，变成了一场道德教化工程。如《韩非子·五蠹》：“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这是宣扬舜在楚地区的文化和道德感化力量。《荀子·成相》中对此更为夸大，“尧不德，舜不辞，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万物备。……禹劳心力，尧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举舜畋亩，任之天下身体息。”因此，舜征三苗，南面而帝，并在当地传播文化道德，几乎可以看做是楚民族历史的源头人物。

对于舜的“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的学者认为，“修教”与“舞干戚”的内容就是传播当时中原的巫觋文化。因此，舜对南蛮的武力征服，冲击了三苗地区原有的巫觋传统，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征服，其结果是“三苗地区全盘接受了虞夏的文化，尤其是巫术祭祀文化。而此后，中原地区的文化在不断往前发展，巫术最后退出了历史的中心舞台，而在楚地却得以保留，楚地恍如与世隔绝。舜无疑就成了三苗祭祀文化的启蒙者。”^①

作为三苗祭祀文化启蒙者的舜，很有可能兼有神巫的性质，他被择取作为屈原的神游之侣、陈辞对象不是偶然的。在所有的历史人物中，屈原唯独可以向他陈辞对话，与他一起同游玄圃，所呈现出的是一种人神交通的状态。所以，舜的形象完全符合一个能够携人遨游太空，与神相见，可以为人类代言的神巫形象。舜的历史地位，也决定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巫。朱熹注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得此中正”一句云：“此言跪而敷衽以陈如上之词于舜，而耿然自觉吾心已得此中正之道，上与天通，无所间隔，所以埃风忽起，而余遂乘龙跨凤以上征也。然此以下多假托之词，非实有是物与是事也。”（《楚辞集注》）而辞中还写到了“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等具体神游行为。可见，舜作为神巫虽然已经成了一去不返的历史，但在楚民族的观念里，这个通天神巫的形象一直没有泯灭。他的确是作为楚地祭祀文化的启蒙者，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地区。所以，屈原辞中舜的地位尤其突出，和这段历史是分不开的。

另外，舜葬苍梧衍生出楚国祭祀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即祭舜文化。《尚书·舜典》说：“舜……五十载陟方乃死。”注曰：“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史记·五帝本纪》对此记载更详细：“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屈原辞中多次提到“九疑”，便是舜之葬所。九嶷山是祭舜的重要地点。《水经注·湘水》中提到这里有过祭祀舜的遗址，云：“营水出营阳冷道县南山，西流经九疑山下，……山南有舜帝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山之东北，冷道县界，又有舜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古地图中绘有“九疑山”，山西侧注有“帝舜”二字，图中“向南绘了九个柱状符号，向东绘了七个柱状符号”，谭其骧先生撰文称“九条柱状物当系舜庙前的九块石碑”^⑧。这些都能为我们证明，祭舜不但实有其事，而且规模浩大。而且，在楚地区的很多地方，包括“楚夏之交”的陈国，都存在对舜的祭祀活动。《史记·陈世家》：“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而后来陈国为楚惠王所灭，成为楚国的一部分：“二十四年，楚惠王复国，以兵北伐，杀陈湣公，遂灭陈而有之。是岁孔子卒。”近年，在现湖南永州九嶷山地区发现玉琯岩遗址，即唐、宋两代祭祀舜的大型遗址，并出土了大量随祭物品^⑨。因此，无论是从空间地域之广度上说，还是从历史时间之跨度上说，楚地区的祭舜文化一直久盛不衰。

另外，舜的爱情传说符合楚地民间的欣赏口味。楚人的祭祀带有原始性，他们偏爱带有性色彩的内容，有“人神恋爱”的倾向^⑩。因此，伴随舜成为神灵的二妃的祭祀地位也重要起来。二妃的存在也反过来使舜的历史传说更有传奇色彩，被人津津